

实现可持续发展:终身学习时代的教育重构

——访东京大学牧野笃教授

本刊特邀记者 陆素菊

[编者按] 牧野笃教授,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终身学习研究室主任教授,日本知名的终身教育理论和近代教育思想研究者。他长期潜心于终身教育和学习理论的重构,还带领研究团队致力于基于区域发展的终身学习与教育实践模式探索。本访谈重点围绕终身学习时代的教育重构主题,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缩写 ESD)切入,阐述了如何客观地看待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给人的发展带来的挑战。牧野教授分享了他参与和推进的区域开发与终身学习实践案例,并与国际终身学习论的国际趋势相衔接,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重构给出了基于日本实践的理性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日本的历史背景、文化理念、社会结构与中国存在差异,但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实践经验,对于同样面临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希望牧野教授所勾勒的区域政府、企业、大学以及社区市民等多元主体相互融合,超越原有学校教育体系的框架,特别是区域层面的结构性重构实践,能为我国终身教育时代教育体系建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教育重构;日本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5)02-0004-12



记者:牧野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基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和民众的终身学习需要,实现教育体系的重构与融合?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都把教育改革放到新的背景下加以审视,教育被作为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997年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国家战略,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近年来您主持的日本“作为社会教育的ESD”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进展和主要观点。

牧野教授:我很高兴就可持续发展与教育的话题和中国同行交流。首先,我们看一下可持续发展教育概念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

velopment)概念,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200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2005年到2014年确定为联合国教育未来可持续发展十年,2004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塑造未来教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从此可持续发展教育便成为新世纪全球教育的目标,教育开启了新的变革时期。不少国家的案例都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一种让我们对教育与学习重新思考的机制,十年计划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能力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教育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教育改革的催化剂。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客观上要求理性审视社会经济结构的弊病,对教育进行变革。

从日本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进展看,2006年3月确定的实施计划提出,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和自我意识,能从身边事做起,能够成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者,并强调培育人的自律、判断能力、责任感等基本素养,尊重与他

[收稿日期] 2014-08-11

[修回日期] 2015-01-02

[DOI 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15.02.001

[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民工荒’背景下劳动者职业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向——基于劳动经济学的探索”(DJA110288)。

[作者简介] 陆素菊,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责任在于培育可持续发展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意味着需要培育能推进人的意识和生活方式变革的人才,培育通过职业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人才;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初中等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包括在岗培训)和区域政府的共同参与,要求学校教育以及学校外各级各类教育形式进行变革。

日本社会教育研究学者围绕“作为社会教育的ESD”这一专题,近年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我们去年举办的日本社会教育学会第六十届研究大会^①回顾了整个过程,从“生物的多样性与终身学习”“环境污染与教育”到“劳动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研究的主题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拓展到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东京农工大学的朝冈幸彦教授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时代下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提出有必要明确环境教育与环境学习不同,要重视学习者的视角和立场,主张基于个人意愿的环境学习更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时代,需要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整合起来,促进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融合,把学校作为实施环境教育和区域教育的平台;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要“放眼全球,始于足下”(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区别于以往整齐划一的教育,要求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方式,重视基于区域的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学习。

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视角探讨社会教育概念的时代特征也是日本社会教育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如法政大学笹川孝一教授提出,对ESD的S=sustainability的理解,除了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可持续性两个侧面,有必要加入人类可持续性的内涵,因为没有承担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时现代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人的毁坏,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很困难。他还提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把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命题。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的习得与知识的创造相互割裂,被知识所支配的教育需要反思,我们有必要结合来自区域的创造知识事例,重新认识知识习得与知识创造、学习与学问的关系。从教育学视角看,在学习与学问分享的过程中,人格和关键能力等将得到重构;从

社会教育变化的历史轨迹看,社会教育的再定义已成为必要。他强调,有必要把“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学”和“区域社会的教育学”进行整合,社会教育要明确与终身学习和教育、生涯规划之间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建构包括家庭与家族的教育、区域教育、职场教育、学校教育在内的具有多元性的教育结构,共同培养足以推动社会发展的人。可以说,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教育自身需要重构,社会教育概念内涵也将需要不断拓展,社会教育学的意义将需要得到进一步明确。

上述研究观点,共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背景下社会教育需要变革的课题。确实,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产业社会带来的人类异化问题,已经到了该反思教育的存在意义,重构教育体系的时候了。如何理性看待现代国家制度所派生出来的学校教育局限性,以及后工业社会即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人被劳动排斥并陷入异化的困境,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如何在区域实践中处理好教育与学习的关系等,都已成为教育改革的现实课题。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终身教育和学习运动的推进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记者:日本在二战后创造了经济高速成长的神话,但正如上述观点所提到的,产业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的毁坏,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很困难。经济发展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人类自身发展的困惑,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共同问题。您一直注重从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趋势探讨终身学习与教育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那么与国际终身教育和学习理论相联系,您是如何看待日本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问题与教育体系建构的关系的?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或者说从人的异化问题的产生到可持续发展的探讨,是否意味着为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

牧野教授:确实,日本走过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相似又有所不同的工业化道路。我2005年的论著^②中曾就日本模式的终身学习发展历程作过梳理。简单地说,日本社会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成长之后,20世纪70年代进入低成长期,80年代又进入信息化社会。随着日本社会的转型,学校教育逐渐出现了

功能不全的问题,人们要求国家为自己提供学习机会,寻找可以替代学校教育的新教育制度,于是社会转型使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成为人们的现实需要。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教育时代与终身教育和学习体系的建构密切关联。在内在机制上,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知识资本分配方式有关,实现社会转型需要知识资本分配方式的转变,需要有新的教育和学习的理论和实践。

在我看来,日本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的建构,既受到国际终身教育理论的影响,也是自身不断探索知识资本分配方式转变的过程。日本是单一的社会,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相对简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制度把国家指定的知识分配给民众,把民众培养成统一的国民,并让他们作为公民参与国家建设。但进入信息化社会后,日本出现了人被过度的劳动所伤害,被劳动机会所排斥,无法确保人自身的尊严,无法确保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克服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与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也重视将朗格朗从个人的异化问题所提出的终身教育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在朗格朗之后,捷尔比从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困境和先进国家民众的异化问题出发,提倡学习的社会化,将知识从某一权威解放出来,主张通过学习,促进人们对目前生活的认识,提高人们对社会结构的认识;通过学习,促进民众之间的交流,以民众生活为基础打破原有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帮助人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主张在日本区域发展与终身学习中得到实施,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

可以说,国际终身教育与学习的主张,无论是朗格朗还是捷尔比都围绕知识资本分配模式展开。两者都否定以往知识资本分配仅限于学校教育这一国家制度模式,主张知识从狭窄的学校教育中解放出来,使之贯穿社会和人的一生。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异化问题,也为终身学习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我看来,日本开始重视如何在集体或人与人之间推广终身学习,试图通过终身学习把社区中孤独的人们结合在一起,构建新的人际关系,在学习过程中促进人的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异化现象的出现,更需要探索终身教育与学习的日本模式。日本各地应运而生的“可持续发展区

域”的探索,既是日本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变革,也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模式。这些实践引导着日本原有知识资本分配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和区域实践,为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

记者:日本在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因社会结构性变化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在中国一些已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区域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经济社会转型与人的发展的话题开始得到学界关注。在您看来,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给学校教育改革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牧野教授:日本社会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可以从多方面理解,首先是急速的少子高龄化与人口不断减少现象。日本从2005年起出现人口负增长,现在总人口数1.28亿,预计到2050年将减少到9000万,2100年5000万。同时,日本的高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25%,为世界最高。这一比例到2035年将达到33%,2050年超过40%。同时由于生产人口的不断减少,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国内市场逐渐缩小,政府财力因此将不堪重负。其次是经济的低成长与劳动方式的变化。自1985年日元升值和1990年代经济崩溃以来,日本长期处于经济低成长状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在日本日益空洞化,加之快速的信息化的,带来了企业内员工结构不断趋于流动化。劳动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约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处于非正规雇佣状态,就业不安定状态使得一部分劳动者生活困窘。其结果表现为人们的迷茫与孤独感的不断蔓延,自杀率居高不下。据统计,日本1998年之后的13年中,每年自杀超过3万人,其中60%为男性,原因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这与就业的不安定状态密切相关。

上述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从经济方面看,日本长期以来采取凯恩斯主义与泰勒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福利制度,即通过扩大市场,增加民众收入;通过财政投入提供社会保障,帮助民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帮助群众改善物质生活。进入经济转型期后,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强调个人的自我责任。由于国内市场的多样化并急剧收缩,即便采取财政介入的方式扩大市场也变得毫无

意义。其结果是社会保障不断倒退,民众被要求自我责任和自立,人们不断被推入孤立的境地。从社会方面看,由于人口减少,国内市场衰退,就业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制度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终身雇佣制度逐渐走向解体,过长的劳动时间与非正式雇佣并存,劳动者失去对劳动本身的自豪感,就业不安定直接导致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群扩大,多元和分散的价值观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行政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日本以行政宽松为基本策略,中央集权转向分权体制,直接导致人们的生活场所——区域社会的解体。明治维新以来,以小学区为核心的生活场所的丧失,使得人们失去了交流的场所。在这种状况下,人们需要重新创造或找回他们在社会的存在感,以这种存在感为基础创造新的社会,建设以人们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基层居民自治社区。

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作为一个产业社会,曾经是一个高度分配的社会,包括受教育机会、劳动机会,高度的社会统合以及高工资、高福利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定感、国民的一体感。但是,以上的种种问题表明,以往的社会正逐渐解体,人们共同的归属感已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切断,人因此被孤立,人们开始自我怀疑,追问自己的生存价值、人生意义和劳动意义,人们因看不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困苦,因在工作场所无法从劳动中感受自己的存在,追问劳动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而成为自杀率上升的社会原因。同时,学校教育因其环境、时间、空间过于整齐划一,导致人们身心俱疲,甚至崩溃,正规的学校教育无法适应人的多样化需要,其局限性使得人的可持续发展已然不太可能。

记者:面对曾经的“高度分配”社会的逐渐解体,正如您所指出的,适应产业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这一知识资本分配模式已经出现了功能不全问题。那么,面临这些变化,日本政府采取了哪些应对策略?取得了哪些成效?还面临哪些课题?

牧野教授:任何事物都是物极必反。人被异化的社会特征在于:人们的价值观不断多样化,生活逐渐个别化,社会结构开始分散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校教育,即传统的知识资本分配模式出现了功能不全问题。人们虽然还在重视学校教育和追逐学

历,但实际上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往产业社会统一的自我结构开始崩溃。为了适应新的信息化、服务化以及个别化社会的多重化自我结构的需要,以往的知识分配的权威主义结构正面临危机,学校教育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知识分配和生产机构。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众开始成为利用因特网等新工具生产和分配知识的主角,加上他们生产的知识具有价值上的多样性,所以没有某一种唯一的核心价值观。为了适应社会这一变化,日本政府开始寻找新的应对策略,比如放弃以往的知识管理方式,在法律上取消具体的规定,制定保证国民自由生产知识的框架,给国民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

可以看到,日本1990年颁布的《终身学习振兴法》,主要目的是推进终身学习的产业化,推进营利组织参与教育领域办学,并提倡终身学习的自我责任,包括因有钱学习而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或者由于没钱而无法获得学习机会,都被视为自我责任。虽然人们批评政府放弃保护国民的责任,但在我看来,这部法律保证了很多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为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终身教育提供了条件。通过这部法律可以看到,政府承认社会的知识生产和分配机构的变化,国家已经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甚至管理的主体,每个国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地区特征参与生产和分配知识的活动,以促进整个社会和价值结构的多样化,甚至认同整个国家的多极化。

从该法的实施结果看,以往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民间组织和企业开始将生产知识视为产业化,通过市场促进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的普及,并把市民生产知识视为商机。学术界也受到很大冲击,主要是由于他们将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社会的到来视为对其知识权威的威胁,但又无法否定这一社会的变化,因此很多地方会在传统的知识权威和市民生产知识之间发生矛盾。另外,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原有中央集权福利国家的行政结构逐渐解体,重视双向互动的网络型社会正在形成,同时为了解决学校教育制度功能不全问题,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学习方式,客观上要求区域建构学习共同体。因此,除了国家法律制度,更需要各种主体共同参与构建新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日本教育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课题。

记者:正如您所指出的,学校教育已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知识分配和知识生产机构,作为学术界对原有知识分配方式的改革尝试,近年来您带领团队,积极推进为了振兴农村区域的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实践探索,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一尝试的基本设想和实践过程、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以及今后的课题和展望?

牧野教授:我们的实践探索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种教育应对。结合我对日本社会结构性变化的考察及其背后原因的探寻,可以说建设“可持续发展区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践的初步成效也证明,这种“可持续发展区域”的建立在实践中是现实可行的。我在《人的生存社会与终身学习——连接柔弱的我们》^③一书中,对我团队所参与的社区学习活动和可持续发展区域的实践案例及其意义作过总结,在此可以和大家分享。

2009年,我带领研究团队与丰田市共同实施振兴“人口过少农村·山村”的实践项目。该项目先从分析原因入手,寻找社会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契机,尝试建构能够沟通城区经济(市场经济)与周边经济(农村和山村)之间的桥梁。

首先,我们调查发现,造成农村人口过少的原因主要有: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出成为企业劳动者,农村的功能从原料供给地转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国外农产品大量输入,导致日本国内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户收入减少;加之区域存在长老支配,固守土地和老宅,排斥外来人口的保守思想,以及动物出没的侵害,生活便利的倒退,更加剧了年轻人的流出;自治组织的弱化,人口老化和减少,造成了农村的恶性循环。我们也看到,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和挑战。由于高龄化的加剧和制造业的空洞化,雇佣劳动不断减少,促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追求规模转向重视质量;人们从重视收入变为重视网络,从重视价格变为重视食品安全。城市退休者出于对老后生活的考虑,期待通过所谓“LOHAS”(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健康可持续的生活,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新的人际关系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成为我们重新认识农村和关注农业优越性的契机。但我们也认识到人口稀少依然是农村发展的严峻课题。因此,我们决定将架构城

市即市场经济与农村山村即周边经济之间的桥梁作为我们实践项目开展的主要目标。

该项目的基本设想为:通过人的网络化把农村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建构能够产生新的生活价值的体系;通过沟通城乡之间的人际关系,把城市大量的退休高龄者和年轻劳动者的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联系起来;通过形成连接市场经济与周边农村经济的事业体,将市场收益返还给农村,提高收益,创造就业机会;最终建立能够提升农村作为新的公共性价值的体系。具体步骤包括:建立连接城乡的公共性企事业实体,获得市场赢利,创造就业机会;同时把部分赢利返还农村,确保农村作为公共财产的价值,提高农村的市场价值;建立由公共行政部门、企业经营部门以及研究部门等相关主体共同参加的合作共同体。合作共同体的具体分工为:作为公共行政部门——丰田市社会部区域支持部门地区(旭)支部负责与住民之间的协调,通过行政性措施,将市场赢利返还给农村;作为研究部门——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终身学习研究室(即牧野研究室)负责项目的协调工作;作为民间企业——株式会社 M-easy 负责农业生产指导、专业指导和市场指导,以及农作物的销售,开展农村经营者的教育。由当地行政部门、大学和民间企业以及本地住民参加的“官产学民”共同事业实体,成为推进区域开发、谋求区域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们确定的项目愿景为:针对日益高龄化和人口稀少的农村现状,以城乡共生为基本目标,建构新型农村经营模式,尝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活,在探索农村发展可能性的同时,向全国传递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经营协调者,除了农业生产,还要致力于维持人们的生活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开发区域文化资源,培育能够引领人们创造优美环境和富裕生活的人才。我们的做法是:在选定实验区域后,面向当地住民举办说明会,获得他们的理解;然后在全国募集有为青年,经选考后,最终确定10人获“2009年故乡雇佣再生特别基金”援助;民间企业受丰田市委托,负责开展项目实施;丰田市安排入选者在空置农户家住宿和集体生活。入选青年利用弃耕农地,生产“安全、安心”的农产品,开辟直接将农产品送达城市住民的流通渠道,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生活平台,确立以农业为主题

的可持续发展生活方式。

我们的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外来的有为青年的角度看,他们与当地住民共同生活得到维持,作为农业经营协调者的能力得到培育,逐步接受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与相关主体的合作分工关系得到确立。从当地住民看,他们与外来年轻人之间建立了援助关系,在振兴农村实践体系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除了给外来青年热心关怀外,还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农业机械和工具借贷,农作物提供,以及其它生活帮助。

有了良好关系的建立,入选青年努力成为合格农业经营者,形成在这一土地上新的生活方式的动力。首先,从地方行政部门的定位与作用看,通过与大学和企业之间委托关系的建立,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作为项目协调者提出项目方案并实施管理,相关企业与年轻人之间建立雇佣关系,并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经验和技能指导。地方行政通过与区域居民的沟通协调,帮助他们实现与外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提供生活指导,对农产品进行共同开发和销售,建立彼此的共同理解。作为学习成果,年轻人习得基本的技术和理念,当地住民的意识和行动发生了变化,乡土文化和传统得到发掘与传播,农村新的可能性得到发掘。为了兼顾入选年轻人的学习和当地住民学习活动的需要,社会有识之士和实践经验者举办每月一次的公开讲习会,推进以“日报”为形式的日常指导和管理,以及自我反思等学习方式,这些成为培养和教育农村经营者的重要途径。

从参与项目实施的民间企业对青年人的评价看,对生活环境的适应,对重体力劳动的忍耐力,从自我思考和目标确立,到努力的方式等都得到系统培训;沟通能力得到锻炼;对农业现状的理解,与当地住民之间的联系,以及心与心的交流,对多样性的理解,以及组织能力的提升等,有为青年在振兴农村实践中的学习成效得到充分肯定。

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切实开展农业生产,通过建立与农户契约关系支持他们的农业生产和销售、农产品加工,实现经济上的自立;如何加强与当地居民联系,提高高龄者和儿童的福利水平;如何扩大与城市的联系,促使市民参与农产品的销售等活动;如何通过农村餐馆的经营、农产品的直销、城市居民所需信息服务的提供,形成面向全国的经常性

的价值输送;如何通过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相互联系中创造新的价值,形成在经济活动中,包括高龄者参加其中的相互支持和关怀的农村山村的文化和福利氛围;如何通过对城市高龄者提供各种服务来吸引高龄者的参加,实现农村新的价值观对城市的影响等,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农地和销售网的扩大带来收益的提高,实现由年轻人承担农业的真正运作;通过销售和农产品加工生产,实现由年轻人带动下的区域活力提升;农村实现福利上的富裕,形成与城市联通的网络;最终实现由农村和山村发起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向城市的回流,都是可以实现的。

需强调的是,丰田市尝试的实践意义,不只是促进年轻人的就农,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促进农村的发展,使都市对 LOHAS 生活感兴趣的年轻人迁到人口稀少的农村去,挖掘农村传承下来的文化,将它与都市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生活价值,然后再输送到都市去,引导更多的都市住民来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实践的意义不在于金钱的多少,而在于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才是关键。

记者:从上述项目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过少的农村区域,通过大学与当地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当地居民共同参与和合作,在人才培养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这种实践模式对理性认识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内地农村空洞化问题,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很有参考价值。牧野教授,您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区域,那么能否请您结合所参与的日本区域教育重构实践,谈谈日本在区域层面教育重构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这一重构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模式是怎样的?

牧野教授:我参与的是长野县饭田市以社会教育为核心的区域教育重构实践,在日本很有区域代表性。日本地方行政自治制度以学校为媒介,学区之间相互连接,具有住民自治的性格。近年来,由于住民自治的急剧后退,原有基于地缘的基层自治组织普遍难以为继,长野县饭田市探索以公民馆为平台的社会教育改革,通过建立以公民馆为中心的学习基地,推进区域教育重建。与以往的地缘性共同体不同,该市按住民区域自治单位设置公民馆,配备

专业职员,同时由住民自己组织学习活动。除了学习实践活动,他们还组织由住民参加区域开发实践,促进高度区域自治方式的实现,

从这一实践的背景看,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日本以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行政逐渐向分权型体制转变,原有依托强有力的区域行政支持的以公民馆活动为基础的社会教育实践,以及区域社会的存在方式,开始寻求更为灵活多样的区域住民组织的合作,建构有别于原有住民地缘型自治组织的住民自治。在这一过程中,代替原有的地缘型自治组织如何基于住民自发意愿,建立包括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区域的协议会等部门在内,并与原有的区域社会和区域居民重新建立联系,要求以公民馆为中心的社会教育尝试新的实践模式的探索。基于饭田市整体重构的内在需要,区域自治体确立了通过可持续发展区域——“定居自立圈”的建设,将饭田建设成“文化经济自立城市”的目标。在分权化的潮流中,基础自治体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立,并保护居民的生活成为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

作为可持续发展区域的实现途径,饭田市确立了通过搞活经济和人才引进计划,推进产业进步、人才培养和区域发展的“人才循环”构想,以保证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平衡,实现文化上的自立。为了把饭田市建设成为具有适宜居住的经济基础、富有魅力的“文化经济自立城市”,项目强调以人才培养为基础,落实人的发展主题。实施内容包括建设适宜长期居住的区域,培育“愿意”回来的人才,开发“能够”落地的产业,推进地方自治、搞活地方经济计划和本土育人能力提升的合作体系计划。“人才循环”计划把如何培养并使之定居且能承担“文化经济自立城市”建设的人才作为基本课题。也就是说,只有培育能够连接产业和区域的人才,才能催生扎根于区域产业的文化,营造多样而富有魅力的文化,使居住于这一区域、作为经营生活主人公的居民获得自豪感。

可持续发展区域的实现,需要行政(自治会)、市民(居民)、产业界和经济团体的共同参与,形成人才培养的“地育力”。具体来说,这种实践模式是以自治会为中心,通过与公民馆的合作,发掘本地文化资源并赋予其价值,同时通过组织本地居民对区域的理解和学习,推动居民的自主性区域开发,由此

形成区域人才培养的“地育力”。我们可以将这种“地育力”定义为:通过利用饭田资源,培育对饭田区域的价值和独特性有自信和自豪感的人的能力,包括通过自然体验、生活体验和交流体验,提升生存能力和社会能力;通过职业体验教育和生涯教育,开展包括家庭、学校和区域在内的、有助于人才培育区域能力提升的网络建设等多样活动,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培养实现未来梦想的能力。

上述“地育力”的形成,公民馆的作用不可或缺。可以说因公民馆的存在,区域人才循环才能成为不断被组合的动态循环。公民馆除了保持原有与基于地缘的自治组织之间的联系,还将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等不限于地缘关系的基于志同道合或兴趣爱好的团体纳入区域社区。正因为覆盖区域的具有多样价值观的灵活而多种部门的形成,原有地缘型自治不断产生的“破绽”才得以修复,住民自治的组织化才可以动态建构。以公民馆为中心的居民学习,因知识的循环和生成,不断造成新的区域社会“破绽”,又因与志愿者组织等灵活的居民组织产生关系,区域社会不断得到改变完善。

因为有了公民馆的存在,在开发区域人际关系等资源的同时,提升了居民的意识,产生了新的生计,乃至当地产业也朝着新的方向转变,并得到发展。这样,经济不再只被看作单纯的生产、消费与流通,而是通过与同一社区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形成新的生计,产生新的价值。我们努力探索生成这种新的价值的路径,尝试与地方政府、民间企业的合作,开展了许多实验性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效。

公民馆作为区域人才培养和循环的场所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原有的公民馆相比,它的存在及功能有了新的定义。作为区域居民能够自己经营区域获得能力的场所,公民馆与其它新部门之间通过志向和兴趣等新价值的结合,与区域之间建立联系,实现从原来地缘空间的自我解放,区域因居民的存在而得以重构;为了使饭田市在整体上成为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公民馆不断推进区域或超越区域部门的相互交流,成为推进居民相互学习和责任分担的核心力量;通过人才这一中介,将经济与福利、文化相连接,促进富裕区域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区域作为人们生活课题本身,成为通过生活课题的解决、生活不断得到改变的经营体形成的核心。

记者:从上述实践中,我们看到了社会教育的重构,也看到了人在区域中存在的重构。在可持续发展区域形成的过程中,公民馆成为区域人才培养和循环的场所。它通过人才这一中介,促进区域、产业和人的发展的平衡。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也是教育和学习体系整体重建的过程,学习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学校学习,区域成为学习的重要载体。您在前面也提到,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的建立,需要新的机制,您参与的实践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循环的出现?与以往整齐划一的学校教育相比,您主持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实践中,新的学习观重构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大学在其中起怎样的作用?

牧野教授:重构是建立在对原有制度反思基础上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决定了学校是社会的知识资本分配机构,人们都希望能够平等地进入知识分配机构,获得平等上学及进入高一级学校的机会,以便获得社会优势地位。但是,在变化加剧的时代,人们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有学校教育已无法适应,需要在大教育体系下,探讨新的大框架,这种框架是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建构和融合。从上述实践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为振兴人口稀少农村的丰田实践,还是“可持续发展区域”饭田市尝试,我们都是打破原有封闭教育体系,探索新的知识循环,这可以说是日本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建构实践的重要部分。

我们通过区域学习活动,进行了社会教育的重构,人们也因此得到重构。在产业社会与现代化过程中自我迷失的人们,在区域化学习中重新获得自我,在不断学习和自我重构的过程中,学习方式逐渐实现从“人的异化”向“人的建构”的转变。日本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的整体再建构,推动的不是政府,不是以往的由政府主导、通过政府统一进行建构的,而是在整个社会多样化或多极化的过程中,每个社会活动主体参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事业和知识分配结构的再建构事业。由此我们努力实现从“为了终身学习的发展而建设社区”到“通过终身学习的发展而建设社区”的转变。通过这种知识生产结构和知识分配结构再建构的过程,可以创造新的自由、公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市民能够成为知

识生产和分配的主体,市民主动地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和新的产业领域,最终促进市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实现人们和平共处的社会。这是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分配结构的新的教育重构的主要特点。

上述显示,日本一般市民参与生产知识的尝试已经开始,包括出现一些“小工坊网络化运动”——市民自己开办小工坊,在小工坊参与学习与发挥创意,每个人变成生产知识和创造价值的主体。日本的终身学习,通过这些运动使一般市民参与知识和产权的生产,将小型工坊和计算机房分布在社会之中,以保证市民自由参与知识和产权的生产,并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促进整个社会的多样化。从机制看,它改变了以往的学习与劳动的分离状态,学习产生于劳动,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可以说,日本社会终身教育整体结构的再建构,实际上是根据社会的多样化甚至分散化而进行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系统的再建构,主要特点是根据每个人和每个场所的具体情况将知识生产和分配的方式进行调整和再构筑,并创造整体上的多样化社会。

当“可持续发展区域”被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区域便成了学习的重要载体,学习成为区域得以存在的核心。作为学习主体的“居民”,也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变化不息的。为了实现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性转变,学习将发挥重要作用。学习概念正在变革,学习不再是一个从上面的人分配给下面的人的活动,它必须是人们在平等关系中的互相教与学,互相传授,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和知识。从学习观来看,产业社会的变化,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工作场所学习、社区学习与区域振兴在内的变化。在可持续发展区域的实践中,“学习”这一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学习促进居民的流动和分散化,促使他们勇于建设新的社区,促使他们主动减轻社会的负担以促进社会的再次统一和创造人们生活的安定。

在这种社会转型中,我认为以往负责知识生产和分配的中心机构,即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作用很重要。大学之所以参与到这项新的事业之中,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随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以往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生产知识的中心,也是分配知识的主体。现在,我们应当承担将知识创造和知识分配衔接起来的责任。

我们要承担生产知识的任务,还要承担分配知识的任务和促进知识社会循环的衔接任务。我的研究室在社会各个领域创办所谓小型的咖啡厅,我们将它叫做 Learning café(学习咖啡厅)。在这样的咖啡厅里,我们与市民尤其高龄者交流,促进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知识的社会循环,并接受他们对我们知识的影响,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大学社会角色的变化,也是创造新知识的机遇。从这一角度看,在中国这个多样化的社会里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其方法是很显然的,那就是根据社区范围内特定的需求与当地群众交流促进知识的循环,使他们成为知识生产和循环的主体。大学可以将自己所传播的知识和社会所产生的知识相结合并创造新的知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安定做出新的贡献。

对终身教育实践与人的培养的关系,我主张让学生到终身教育的现场去,多接触实际工作和活动的人员,并与他们建立互相认识和学习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使他们站在与市民之间,尝试认识自己的存在。这样可以使学生形成自己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体,也将自己形成动态的存在。

记者:牧野教授,您践行区域学习活动,改变了以往劳动与学习的分离状态,改变了“人的异化”,实现了“人的建构”,这些让我们耳目一新。确实,基于区域的教育重构意味着对原有教育制度的扬弃,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内,原有的教育制度在重构中得到优化和重构。我读过您在日本产业教育学会上所做的主旨报告^④,从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视角审视企业存在方式的变化,分析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企业教育之间关系从分离到趋近,特别是关注从“必要”的分配到“关系”的生成中,实现“人的建构”过程,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观点?它对我们理性处理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能很有启发。

牧野教授:我们为什么关注“关系”?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在日本社会结构中,当这种关系被切断,人们自然处在自我封闭中,在获得自我认识的小宇宙中自给自足,得不到变化中自我满足。当这种状态被无端打破时,就会形成一种压力,造成一种精神上的障碍,这是工作场所抑郁症蔓延的主因。以往的工作与学习的循环是一种与他人之间因为“必

要”被迫形成的循环,是因为“必要”而被社会分配的结果,是不得不接收的循环。在今天,这种必要的分配正在消失。因为物质丰富,社会变得什么必要也没有了,那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的人由于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会产生交友和沟通的需要。我们的实践证明,终身教育与学习可以解决人的孤独问题,教育重构适应了日本社会教育的变化,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相互分离的状态在改变。正如我与职业教育学者交流的那样,在日本正因为这种重构,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从原来的分离到逐渐融合。

在日本,成人教育更多用的是“社会教育”一词,主要指民众教育运动以及相关的制度;企业内教育则指企业为了实现其市场经营的需要,在企业内实施的员工培训与教育活动。在法律上,原日本教育基本法第七条有关社会教育条款第一项规定“对于在家庭及工作场所以及其他在社会实施的教育,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给予奖励”。但实际上,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与劳动行政部门的分割,社会教育研究者难以开展对企业内员工培训与教育的研究,加上社会教育研究者对企业培训抱有成见,社会教育不把企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以往社会教育对劳动青年教育和劳动者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对被企业社会忽略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因此,一直以来,职业教育以及生涯教育、技术教育等,与职业能力开发的教育,没有受到社会教育研究者关注。

如何看待两者的趋近可能性?正如我们实践所探索的,日本多主体参与的区域终身教育和学习实践已经使原来疏远的教育与企业逐渐走近。可以说,只有在终身学习时代,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才有可能走到一起。事实也如此。随着相关法律的修订、企业的变化,学习成果开始实现跨企业的评价。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使个人的职业生活与终身学习有了密切的关系,教育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为了实现人的“体面就业”,企业需要一种“可雇佣能力”,特别是从成人教育角度看,职业继续教育和学习成为重要生长点,确实也发挥了主要作用。同时,从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看,为了消除工业社会导致的异化问题,一方面“体面就业”要求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人们提供职业能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除了正规教育,还需要非正规培训;另一

方面,由于人的存在感因人际关系的摧毁而逐渐变得个别化和分散化。终身教育使我们意识到知识资本在社会上的分配和再配置的结构问题,只有改造我们的知识分配结构,才能形成平等、和谐的社会。

日本终身教育的实施,使人们摆脱了学校教育的约束,发现自己新的变化。人们在利用学校教育获得国家权力的知识分配的同时,在学校外也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终身教育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减轻社会的教育负担,增强整个社会的活力;终身教育的普及,推进了市民自律、自觉地参与学习,带来了新的自治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企业发生了变革,大学与民间企业之间形成了新的合作,高龄化社会的学习社区建构,最终实现从“必要”的分配,到“关系”的建构过程。当然,目前日本社会虽然处于终身学习与教育整体再建构的过程中,但是这一再建构的过程并不像以往一样由政府主导、政府统一推进的,而是在整个社会多样化或者多极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特点是根据每个人和每个场所的具体情况对知识生产和分配的方式进行调整和再建构,并创造从整体来看多样化的社会。社会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参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事业和知识分配结构的再建构事业。我们大学也开始参与到这项新的事业之中。我们很期待通过这种知识生产结构和知识分配结构再建构的过程,新的自由、公平的社会会出现。在这种每个市民能够成为知识生产和分配主体的社会里,市民主动地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和新的产业领域,最终促进每个市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和平共处的社会因此得以实现。我们目前考虑的是在少子高龄社会尤其高龄化率超过40%的社会里,如何保持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如何实现质量较高的幸福社会。大学已经开始与一些地方市民联系,建设高龄社会的知识传播网络,并从事高龄者的能力开发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互助关系,使人们的生活安定下来,并促进高龄者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能力的提高,保持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

在终身学习与教育整体的建构过程中,企业成为终身学习和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这种学习不仅是学习企业发展需要的技能,与工资和晋升相关的技能,更有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关键能力,特别是包括职业价值观在内的价值观、社会意识的变革、对个人

的认同感以及对社会的认知,使个人的自我负责、自我学习成为一种自律。当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继续学习、大学的开放,也是结构整体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的企业学习,是一种在相互建构中的学习,它要求建立新的学习方式,即通过工作,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工作后获得自我实现的感受,并将这种感受作为自我发展驱动力。由于这种驱动力的获得,能不断让自己获得工作中的存在感,而且这种自我存在感,能同时感受到与他人的共存。这种学习与广义上的“学习”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所谓学习,被认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自己成为自立的人。也就是说,学习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知识,让自己发生变化,获得一种确认,给自己一种动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解放自己,让自己得到螺旋式的提高,这是学习的基本机制。学习者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建构,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在社会中发现自己的定位,让自己不断成为新的自我,无疑这种学习与“工作”重迭。

结合我们实践的初步成果,可以说,我们研究室通过项目推进的学习与以往的学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诸如制造业的社会化,振兴农村的援助,跨年代交流社区的建设,以及因居委会(町内会)人际关系的重建而带来的结构性的生成与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发展等,人们在这些活动中的状态,本质上就是学习的循环。人们因为参加活动,发现新的自我,这一新的自我,又走向下一个新的自我的变化,并有意识地建构新的自我。在与他人关系中获得自我变化的驱动力,推动建构这种具有事后性和过剩性的循环。

这种新的学习方式的意义在于:它首先是由于新的自我的生成而生成新的社会。其中,最初的“无偿的赠与”是必要的,进行这种“无偿的赠与”的是大学等具有较高公共性的部门。当这种循环被引导时,人们从自我存在意义的追问中解放出来,从物质追求中解放出来,富有活力地与他人并肩,实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学习观的一种超越。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在劳动与生活的融合中得以产生。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以往的一元化价值观支配下的秩序,而是价值多元、并列,并且在相互对抗的社会中获得共存同时自我生成、不断变化的存在方式。以往因“必要”的分配而产生的事后的过剩循环,正转变为与他人关系中生成的事后性的过剩性的循环。这种

学习方式是新的人际关系建构,在“我”与“我们”的关系中,获得自我的感觉以及生成自我本身作为劳动再生产的社会,这才是今后作为企业组织被要求的生存方式。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现场,已经没有必要追问劳动的意义,因为在那里,人们通过工作,与他人一起不断建构、持续变化,并且自我与他人共同形成“我们”,自己的工作作为能感受社会定位的“我”得以存在。在企业组织中,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共同实现自我的生成,正因为这一点,有必要实现“劳动”作为“学习”的形式。

记者:牧野教授,无论是对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日本社会教育概念拓展的探讨,还是您主持的基于可持续发展区域的终身教育与学习整体再构建实践,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工的劳动流动性加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扩大,中国已经进入转型阶段,您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体系有何建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您在安徽调查农科教结合实践,关注中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也一直关注城市的社区教育,目前城乡统筹教育的推进、新型农民和职业农民的培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您对中国教育重构有何建议?

牧野教授:首先,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自我寻找的需要。日本经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高速发展期,七十年代开始进入信息化或服务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的特征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生活的个别化。产业界已经不需要大量而均质的劳动力,同时日本社会进入少子化和高龄化,人们对物品的需求开始个人化,社会结构开始分散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育面临学校教育功能不全的突出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产业社会所需要的统一的自我意识开始崩溃,学校教育开始失去其对民众的向心力。适应信息化和服务化以及个别化的社会结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管理和分配机构。于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政府放弃以往的知识管理方式,比如在法律上作出调整,以保证国民自由生产知识,为国民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以市场为手段,促进终身教育和终

身学习机会的普及,可以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当然,日本终身教育与学习体系的建构也是国际终身教育和学习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包括日本在内,一些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社会出现了经济发展停顿和人的异化问题,要求学习的社会化。终身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超越学校教育的国家制度框架,把知识从学校(大学)教育中解放出来,并放在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过程中,这就需要以往的进行反思,这是国际终身教育实践的共同趋势。

从某种角度看,日本终身教育结构的再建构对中国社会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是多样化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分散的。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整个国家开始加强凝聚力,学校教育开始普及,知识分配机构的权威主义结构也比较明显。但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学校教育升学竞争激烈,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产业结构也在急速转变,学校教育的改革跟不上产业结构变化。大学毕业生失业者激增,农村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劳动市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反过来,农村和内陆贫困地区,学校教育尚未普及,人们接触知识资本的机会不均,这些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和谐社会的实现。日本终身教育整体结构再建构的核心是市民自律,减轻政府负担。这一点对中国的社会建设可能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改革主要来自政府的推动。市民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除了政府的力量,还应该提高每个市民的自觉意识。据我了解,上海市民对社会问题的关心程度正逐渐提高,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愿意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贡献的人开始增多。这无疑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生活改善。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教育实践,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我认为,社区教育在中国也不得不由政府来推动,但关键是群众如何参与政府行为,并将它置于群众的具体生活场景中推广,促进群众之间的其它动态关系的形成,使他们将社会上的事看做自己的事,勇于参与社会并解决问题。

三十多年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日本相比,中国社会具有更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东西部差异和城乡差别需要各具区域特点的新的学习方式。我很欣喜地看到,上海目前对社区教育或终身教育投入了很大力

量。随着被市场分割的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与学习问题受到关注。同时,社区教育通过在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中开展共同的学习活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信赖,可以预见这种学习将与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相连接。

今后,如何提高大学对终身教育的参与度是个实践课题。这不仅是大学教师对社区教育或终身教育的研究要加深,而且大学应该动员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实际社会里与群众交流,向群众学习,体会社会融合是怎样产生的,之后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自己对话,产生新的知识,并与其他同学和教师对话,最终能勇于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

记者:在中国,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劳动力流动的扩大,人们学习需求和学习机会的多样化,必将带来学习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中

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施的“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将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态得到新的发展。可以期待,一种新的学习观将在中国产生。

[注释]

①日本社会教育学会第60回大会(2013.9.27-29),专题研究「ESDと社会教育:3年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総括」,东京学艺大学。

②牧野 篤『<わたし>の再構築と社会? 生涯教育——グローバル化? 少子高齢化社会そして大学』,中文译名为《“我”的重构与社会·终身教育——全球化、少子高龄化和大学》(日)大学教育出版2005年11月)

③牧野 篤『人が生きる社会と生涯学習——弱くある私たちが結びつくこと』,(日)大学教育出版2012年4月。

④牧野 篤『必要』の分配から「関係」の生成へ——社会教育? 生涯学習から見た企業,中文译名为“从‘必要’的分配到‘关系’的生成——从社会教育与终身学习看企业”(日)産業教育学研究第42卷第1号2012年1月

(编辑:徐辉富)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Reconstruction in the Lifelong Learning Era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akino Atsushi of University of Tokyo

LU Suju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Makino Atsushi, Director of Lifelong Learning Research in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Tokyo, is a famous Japanese scholar in the theory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modern education. He has long been devo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heory, and also led the research team committed to the practice mode in this field based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nterview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education reconstruction in an era of lifelong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vocated by UNESCO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and presents how to objectively review the challenges due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Professor Makino shared the practical cases of his promo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resented the converg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and put forward the rational thought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reconstruction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es in Japan. Advice from others may help one's defects. Althoug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ultural concept, and social structure are differen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ocial problem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Japan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China, who is facing the sam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lifelong learning outlined by Professor Makino, we can see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communities, and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school system, especially the practice of structural re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level. Hopefully all these will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i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ESD; lifelong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reconstruction; Japan